自序

從「周秦之變」到「漢魏之變」：我的秦漢史教研

1995 年我經張豈之先生介紹，到清華大學歷史系任教授。清華歷史學本來名氣很大，但 1952 年院系調整後變成蘇聯式的工科大學，這門學科在清華就中斷了。我到清華時，該系恢復創設未久，主要人員都是原社科系中國革命史和近現代史基礎課教師。所以，那時系裏搞過中國古代史教研的，基本就我一人。當時歷史系還沒有招收本科生，我除了帶過兩屆研究生外，主要是開設全校性的中國社會經濟史和農民史選修課。到了世紀初歷史系開始招收本科生，上面也要求開設「成套的」歷史系專業課，包括中國古代史的各個斷代史專業課。當時歷史系已經有了唐宋明清的教師，但仍然沒有秦漢這一「斷代」的專家，所以上面就要求我來「補缺」，開設秦漢史專業課。這樣一直到 2009 年侯旭東教授入職清華、我向他交棒為止，我在清華大約教授了七八年的秦漢史課程。這本講義的雛形就是那個時候形成的。

在中國傳統史學的「二級學科」分類中，我是屬於「專史」而非「斷代史」出身的。研究生時期跟隨趙儷生先生治土地制度史和農民戰爭史，當時的重點也放在明清這一時段。20 世紀 90 年代我主要研究的是農民史和農村改革問題。秦漢史本不是我的專業方向，但是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曾經多次「聽從組織安排」去從事並非我「專長」的工作，比如參加陝西通史項目承擔宋元卷和這次去教授秦漢史，這倒也並不全是出於「集體主義」或「團隊精神」的考慮。因為我本身興趣比較廣泛，而且在專史研究中也涉及過這些時段，覺得還是有一得之愚可以貢獻，或者更不客氣地說，對

該「專業」中流行的一些看法也有些不吐不快的意見，所以還是「義不容辭」或者說是「趣不容辭」地接受了。

我們這一代史學工作者是從所謂「五朵金花」的時代過來的。由向達先生首創的「五朵金花」之說，指 1949 年後中國史學界集中討論的五個問題：古史分期、土地制度、農民戰爭、資本主義萌芽和民族融合。這些討論具有眾所周知的意識形態背景，但即使在這個範圍內也未必一直能夠自由討論，在「文革」時期一度萬馬齊喑、「五朵金花」之後，改革初年又重新綻放，並且發展到最高潮。而隨着思想的進一步解放，進入 20 世紀 90 年代後，「五朵金花」討論就已經不再是史學研究的主流。但是如今回頭看，這種史學作為五四以後傳入的「新史學」中最有影響的一支，在其演變成經學化、神學化的「官史學」之前，曾經確實帶來了中國史學的一大進步。至少在兩個方面，它的突破和後繼影響是不可否認的：第一，它把中國歷史納入了全球化的視野，突破了傳統史學除了大中華就只有「四夷傳」的狹隘眼界。第二，它打破了單純敘述王朝興衰、鋪陳人事，而不作制度分析的模式，尤其是打破了「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的傳統「斷代史」格局，而把制度邏輯、社會演變作為歷史的主線。我以為，我們的思想解放，在摒棄經學化、神學化、官學化的同時，當然不應該再回到「二十四姓家譜」的模式去。如果考慮到當年「新史學」還可以出現《十批判書》這樣的作品，「官史學」就一度只能歌頌「千古一帝」，即便後來學界「革命」而回歸「保守」，淡化意識形態而轉趨西方「學術前沿」，還是盛行「子路頌秦王」與新瓶裝舊酒，就能夠感到一種深深的遺憾。

我早年所治的土地制度和農民戰爭史屬於典型的「金花」史學，而在這派史學無法迴避的「古史分期」問題上，我當時持明確的「魏晉封建論」觀點，視秦漢為「前封建」古典（我從不用當時流行的「社會」概念），因此發表過若干以秦漢橫向比較羅馬、縱向比較隋唐的考證著述。在調入清華前，我在陝西師範大學還開過「古代社會形態學」和「封建社會形態學」兩門選修課。即便 20 世紀 90 年代以後，「世道與心路」都已發生重大改變，我現在的研究早已不再是「金花」模式，也不再以社會形態的概念分析周秦、漢魏之別，但至少在上述兩個方面，當年新史學的影響是不會消滅的。我後來使用的「大共同體」與「小共同體」等概念，也明顯帶有當年新史學的烙印。所以在清華開設秦漢史課時，這些學術經歷便起了很大作用，使我的秦漢史課程與一般「斷代秦漢史」有很大區別。

我假設學習秦漢史專業的學生應該具備通史階段的秦漢史知識，沒有必要花時間再講一遍這四個王朝（我認為前後漢完全是兩個王朝，中間的新朝亦非「僭逆」，秦應為四個朝代）的興衰概要，所以絕大部分課時都用來討論這四朝的制度和觀念演變。尤其是分析「周秦之變」和「漢魏之變」。前者要講清楚中國是何以從「三代」帝制的，這對此後的中國產生了怎樣的深層次影響。而後者則要說明這一由四個王朝組成的「第一帝國」如何發生了不同於一般王朝更替的深刻危機，導致秦制後來發生了不同於一般所謂「合久必分」的長時段紊亂，但周制卻復興無望，最終在經歷數百年「中間期」後又走向了秦制框架下的第二帝國。換句話說，我不想花時間給學生講一套「四姓之興亡」的故事，只想在有限時間內梳理一下中華第一帝國時期的「世道與心路」，以給今人提供進一步思考的津樑。我一向認為，中華文明數千年，最深刻的變化就是走進帝制的「周秦之變」和走出帝制的「三千年未有之變」。而且對兩者的認識緊密相關。對前者認識的深淺，關係到後者的成敗；對後者的體驗亦能加深對前者的理解。而在這兩者之間次一等的變化，就是所謂的漢魏之變了。如果本書能夠促進人們對這些變化的討論，我的願望就達到了。

我在清華講授秦漢史雖然年頭不算很長，但當時「超星圖書館」做了全程視頻錄像，據說流傳甚廣，至今海內外仍有不少受眾。當時只是做了課程 PPT，並沒有成書的講義。後來我不再講授這門課，也沒有想到要出版講義。但是，近年來好幾位有心的讀者卻分別根據課程錄像，整理成幾個不同版本的全文本惠寄給我，並與書界的朋友一起，極力鼓動我出版。浙江財經大學的劉志先生還花了大量時間校對引文，去除語病，劃分章節。他們的熱心和奉獻令人感動，也使我覺得出這本書不僅有它的價值，

也還要對得起學生、讀者和聽眾朋友們的厚愛。

當然，從我過去寫的秦漢相關論文，到課程開設期間乃至視頻傳播中，各種評價也都存在。贊同的聲音就不說了，批評的意見林林總總，常見的就是說我的秦漢史不合常規，有「以論代史」的色彩。對此我這裏做一點回應：

過去我們的史學界有過「論從史出」還是「以論帶史」的爭論。改革時期由於對過去史學官學化的不滿，「論從史出」受到肯定，而「以論帶史」譏為「以論代史」。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實際上，那時用以「代史」的論其實只是一些由「信仰」而未經論證的理論教條，而把中國歷史削足適履地塞進教條編織的框框裏，還要不斷根據上面的需要而改變敘事（比如因「十批不是好文章」的指示而對嬴政先生從大批到大讚），這固然不是合格的「史」，但難道這能叫「論」？其實這種思維不改變，即便換了一套意識形態氛圍，比如不再講「五種社會形態」而改為追隨「國際學術前沿」的「後現代理論」，或者從「反傳統」變成「頌傳統」的「保守主義史學」，那種「教條多而論證少」的弊病也還是存在的。

我們講「史」和「論」的關係，其實就是史料和史論的關係，更一般地說其實就是論據與論證的關係。不光是史學，任何一種實證研究，即既非文藝創作也非單純的價值弘揚，而是一種以事實判斷和邏輯推斷為基礎、講究知識增量的研究，無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還是「人文學科」，都是論據和論證的結合。無據而論，固然是不着邊際的空言，有據無論，也會變成不知所云的廢話。有人說「史料就是史學」「有幾分史料說幾分話」，我是不同意這些說法的。史料不等於史學，就像數據不等於數學、實驗室不等於科學家一樣。但要強調的是：論證是一種自己的合乎邏輯的思維，它不等於引述理論。我們看過去「金花」時代的某些著述，往往看起來也是旁徵博引，不僅史料要「掉書袋」，理論更要「掉書袋」。一篇文章幾十個註，史料引證不多，「經典作家語錄」引證倒是不少。有人說這是「以論帶史」，有人嘲曰「以論代史」。其實這並不是「論」多了，而恰恰是「論」極其貧乏的表現。史學不是神學，也不是經學。離開經典作家，

你就不會思考了？

說實話，我受「經典作家」影響也很深。但是除了某些事關知識產權的前人具論外，我是不主張理論上掉書袋的。我的論證主要是自己的思考，當然思考並非憑空，接受各種啟發非常重要。除了「經典作家」的啟發，我認為現實生活的啟發其實是不可少的。例如本書中關於商鞅「壞井田」究竟是國有化還是私有化的問題，關於「鄉舉里選」是怎麼回事的問題，等等，我的一些新見其實都來自生活經歷。看到青川秦《田律》，就使我想起親身經歷過的「山水林田路綜合治理」。而我關於小共同體具有「溫情的等級制」的看法，除了「經典作家」的啟發，其實也來自常識。我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很多問題其實並沒有想像的那麼複雜，而是「大人物忽視常識卻迷信教條」造成的。當然常識不一定對，「證偽常識」往往是重大科學發現的突破口，哥白尼就是把「太陽東昇西降，顯然圍着地球轉」的常識證偽，而開創了近代天文學。但是常識可以證偽，卻不能無視。實證研究者哥白尼和一個無視常識而高叫「太陽就是從西邊昇起」的妄人，根本區別就在於此。

當然，研究歷史要靠史料，史料的書袋必須得掉。但是秦漢史在這一點上也不同於其他「斷代」，因為這一時期存世文獻較宋明以後要少得多，沒那麼多書袋可掉。這一時期的研究比近古時期更加倚重考古，但考古資料與文獻相比恰恰是「不自明」的，其意義更加有賴於論證。再就是秦漢史既然很難發現新史料，對前人研究推陳出新就更重要，而與「多一分史料多一分話」相比，對前人研究無論推陳還是出新，也更需要論證。所以秦漢史研究相對於宋元明清而言，其實就是一個論據相對有限、而更倚重論證的領域。當然，作為一個並非治「斷代史」出身的學人，我在秦漢史方面的論證對不對，還是要敬請方家賜正。

這本書在朋友們的催促和鞭策下，以劉志先生整理的《秦漢史》課程實錄視頻文稿為基礎寫成。但從課程錄製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大約近 20 年，期間秦漢史研究，尤其是考古資料又有了長足的進展。尤其是張家山竹簡《漢律》的發表、里耶秦簡的發現，以及隴東秦西早秦遺址的發掘，

都有重大價值，也出現了許多新問題。我當年授課時這些都還沒有。我歷來主張舊作再版一般不修改，以保存寫作的「時代坐標」。但是這本書不同。一是它過去未出版過，是作為新書出版的。二是當初作為講義是面對學生，現在可能也有這方面的讀者，對學生我應該給他們以與時俱進的知識，而不是提供一個「時代斷面」而已。當年授課時，我的講義是每年都要修改的，現在出書也應該如此。所以這次成書我做了較大的修改補充，篇幅也比視頻記錄稿多了近一倍，至於成效，就期待讀者的批評了。

目　錄

自序　從「周秦之變」到「漢魏之變」：我的秦漢史教研 …… i

緒論　中國文明史上的秦漢時代 …… 001

第一節　秦漢：中國第一帝國　/ 001
第二節　秦漢史授課的重點　/ 003
第三節　秦漢史的史料　/ 004
第四節　秦漢時代的重要性　/ 007

第一章　周秦之變：從族群社會到編戶齊民（上）
——小共同體本位的周制與儒家思想 …… 017

第一節　對周秦之變的評價　/ 017
第二節　周秦之變何以名之　/ 024
第三節　周制的特徵　/ 029
第四節　周制的經濟基礎　/ 048
第五節　儒家與周制的價值體系　/ 053
第六節　周制的危機　/ 068

第二章　周秦之變：從族群社會到編戶齊民（下）
——法家的興起與「百代都行秦政制」 …… 087

第一節　法家的興起及其主張　/ 087
第二節　法家改革瓦解小共同體本位的周制　/ 105
第三節　「百代都行秦政制」——秦制的主要特徵　/ 121
第四節　秦制的危機　/ 127

第三章　法道互補：「儒表法裏」之下的強權與犬儒 …… 140

第一節　從「儒道互補」到「法道互補」：漢初的黃老之術　/ 140
第二節　儒表法裏的形成　/ 158
第三節　「周表秦裏」：由漢武帝到王莽　/ 184

第四章 鹽鐵論戰：帝國經濟中的「干預」與「放任」 206
第一節 「大夫」與「賢良文學」爭什麼？ / 208
第二節 鹽鐵論戰與北宋的「王馬黨爭」 / 216

第五章 強國弱民：秦漢帝國的政治制度 223
第一節 秦漢的鄉里制 / 223
第二節 「五口百畝之家」與「閭里什伍之制」：規定與現實 / 233
第三節 唯上、弄權、枉法的酷吏與循吏及豪強 / 238
第四節 連續的歷史，循環的怪圈 / 251

第六章 漢魏之變：儒表法裏中的「儒裏化」階段 277
第一節 東漢以後宗法復興 / 279
第二節 以禮入法：法律的儒家化 / 283
第三節 官員選拔標準的道德化 / 289
第四節 社會組織變化：小共同體的復興 / 297
第五節 政治邏輯變化 / 305
第六節 經濟現象的變化 / 308
第七節 漢魏之變不如周秦之變深刻 / 316

第七章 秦漢經濟：中國古代第一次商品經濟高潮 349
第一節 集約農業的起源 / 349
第二節 秦漢的水利工程 / 356
第三節 秦漢「名田宅」制度 / 364
第四節 賤商制度下的「偽市場經濟」 / 370
第五節 千古奇文「貨殖列傳」 / 377
第六節 漢唐商品經濟之比較 / 382
第七節 漢代的古典借貸關係 / 398
第八節 古典租佃制——漢代與羅馬的比較 / 413

餘論 444

附錄 對話：傳統中國的「周制」與「秦制」 馮天瑜 秦暉 449

緒論
中國文明史上的秦漢時代

第一節 秦漢：中國第一帝國

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秦漢是一個獨特的階段。

在世界歷史研究中，很多人對一些重大的文明都會劃分時段。這個時段往往具有這一時期最突出的一些特徵，比如古埃及的歷史，人們就把它劃分成古王國、中王國、新王國這幾個階段，[1] 每個階段各包含若干王朝。古王國和中王國之間、中王國和新王國之間，分別叫作第一中間期和第二中間期，也各自包含若干分裂、混亂中的小朝廷。古王國之前還有前王國時期。實際上這樣劃分的依據就是古埃及時期的許多王朝中，古、中、新王國這段時間內統一帝國存在的時間比較長，是一種常態。到了第一中間期和第二中間期，雖然也有王朝，但是就像我們的五胡十六國一樣，短暫且比較混亂，沒有形成那種比較穩定的帝國。

其他文明也是如此，包括瑪雅文明、歐洲文明也是這樣。人們往往說古希臘—羅馬屬於古典時期，或者說古代，後來到了中世紀怎樣怎樣。其實「中世紀」這個詞，它的真正的詞義跟所謂「中間期」基本上就是一回事。很多人認為「中世紀」較之「古典時代」是一個「低落期」，是比較混亂的時代，是介乎古希臘—羅馬和後來的近代民族國家之間的一個比較有特色的階段，現在有人對「中世紀」持有不同的評價，發現有許多亮點，不再認為是「黑暗時代」，這當然可以討論，那是另一個話題了。總之，古典時代之後有一個中世紀。而到了啟蒙運動以後——有的人說甚至是從文藝復興以後，歐洲就進入了一個新時期，逐漸形成民族國家，在此

基礎上出現了一整套近代文明。

因此，這個所謂的中世紀、中間期和前面的古典文明以及後來的近代文明也成了一個分段的標誌。很多人還用所謂的第一帝國、第二帝國，第一共和、第二共和這種稱呼。總而言之，我們也可以按這種觀點去看中國歷史。

中國歷史的分期是一個扯不清楚、非常複雜的問題。很多人都注意到秦漢在中國歷史上佔有很重要的位置，之所以重要就在於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從三代的諸侯林立變成了一個大帝國。在秦漢之前的春秋戰國，就是一個多頭並進、相互爭霸的時期，可以看作「三代」到秦漢之間的一個過渡吧。

而秦漢這個大帝國取得了比較長時期的穩定。雖然秦漢之際、前後漢之際也有兩次「鼎革」之變，但時間都較短，不影響大帝國的制度連續，也奠定了中華帝國後來諸多方面的基礎。而從漢末以後，具體地說就是從「黃巾之亂」以後，中國歷史又進入了一個漫長時段的混亂期。秦漢王朝作為一個比較穩定的大帝國存在的歷史就此結束，中國又進入了一個所謂「合久必分」的階段。

一開始是諸侯割據，然後形成三國鼎立，三國又變為三家歸晉，歸於一統的時間只有短短幾十年，馬上又是八王之亂、五胡入華，中原陷入一場起伏不斷的征戰亂象。一直到公元 581 年隋文帝創立隋朝，之後重新統一。隋唐這一段時間，有人說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帝國發展的第二個時期，除了隋唐之際短暫的亂世，帝國穩定了約三百年，到了唐末五代又走向分崩離析。其實從安史之亂以後就開始動盪，統一的唐王朝基本上是名存實亡，各地都是藩鎮割據，你方唱罷我登場，後來發展成為五代十國。

後來北宋雖然統一了，但是統一是不完整的，長期都是所謂的宋遼夏金並峙，還有大理等國家並存，因此有人說這是中國的第二個「中間期」。直到元統一，元明清三代才又出現了統一帝國的復興，而且應該說元明清三代帝國的範圍要比前兩個範圍還大，它自身處在一個擴展的過程中。

縱觀中國歷史，我們把秦漢這個階段，看成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帝國時代，是有根據的，主要就是依據現在研究一個文明的歷史通常用的那種角度。其實，相對於版圖的分合而言，我自己更重視制度的演變。就制度而言這個階段的特點也是鮮明的。與之前的「三代」而言主要就是「周秦之變」，與之後而言就是「漢魏之變」。這是我們關注的重點。

第二節　秦漢史授課的重點

秦漢這個第一帝國本身是一個建構的過程，從前帝國時代也就是從三代到諸侯林立的這一時期，中國由一個亂世逐漸演變產生出一種帝國下的社會形態。這個帝國自然有一整套維護自身穩定的制度安排。這套制度後來又產生了很多問題，以至這些問題不斷積累，使它最終垮台。中國歷史上有很多王朝垮台了以後都出現戰亂，因此有研究者認為中國的歷史是一種以王朝更迭為基本內容的「治亂周期」。從《三國演義》講的「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到現在有些人講的「亂極生治，治極生亂」，他們認為每一個王朝就是一個周期。但是如果宏觀地看，除了這個周期以外，還有一些更長時段的變化：第一就是這個周期本身並不是一樣的，像我們剛才講過的幾個中間期，往往帝國的穩固性就比較差，這些王朝都比較短，而且幅員也在縮小，內部也不夠穩定。

前述的這三段：秦漢時期、隋唐時期、元明清時期，就顯得比較穩固，它們和其他的朝代就不太一樣。更重要的是，每一段大帝國賴以建立的制度安排和它的一些凝聚力產生的基礎，即使在有繼承的情況下它也有一些不同的特徵，秦漢在很多方面是不同於隋唐的，隋唐在很多方面也不同於元明清。

因此，我們把握秦漢這一段歷史，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探討第一帝國作為它基點的那些最基本的制度安排是怎麼形成的？它包含了哪些主要內容？這個制度在運作過程中產生了哪些弊病？這些問題的積累又如何導致

了第一帝國的解體。

這就決定了我們課堂探討的重點是放在兩頭——「周秦之變」和「漢魏之變」。就像一個扁擔挑着兩個筐。我們並不會像一般的中國史講述那樣，政治、經濟、文化羅列擺開，抑或疏理一個個帝王的繼承關係，而是要探討秦漢這個第一帝國的興衰，這個穩定的而且強大的帝國是怎麼建立起來的，後來它又怎麼垮掉了。至於這個帝國本身的制度運作，我想不論它的合理性還是它的弊病，都可以明顯地從這兩端中看出來。它的合理性，那就是周秦之變何以完成的理由，它的內在弊病，也就是後來發生漢魏之變的理由。

第三節　秦漢史的史料

對於秦漢時代，無論歷史研究發展到什麼階段，無論技術手段如何更新，所謂的「前三史」，或者「前四史」，即《史記》《漢書》《後漢書》以及《三國志》，大概都沒有辦法改變它們是研究這段歷史的基本文獻的事實。

因為這段時間基本上沒有保留下來的野史，或者說很稀少。地方志我們看不到，私家文集基本上也沒有，我們看到的私家文集其實是斷簡殘篇輯起來的，比如清代嚴可均匯輯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大部分也是從正史中一段一段輯錄出來的，實際上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集。秦漢時代很少有個人文集傳世，也沒有地方志，當然也不可能有我們在明清史研究中非常重視的檔案資料。明清檔案在故宮中保留下來很多，主要是清檔，明檔都很少，秦漢更不可能留有檔案。類似於檔案材料的，就是後面要講到的在考古中發現的秦漢簡牘這一類的東西，其中有些材料（如里耶秦簡、走馬樓吳簡等）可以被認為是具有檔案性質，但它的隨機性太強了。

老前輩陳援庵先生說史學家對史料要下「竭澤而漁」的功夫。而如果

研究明清史，僅僅從文獻角度講，要「竭澤而漁」是非常非常之難的。明清史料不僅「浩如煙海」，而且明清又和民國年間不一樣，晚清民國印刷術比較發達，雖然史料很多，但是由於有印刷術——不是指雕版印刷，而是現代印刷，致使這些書絕大部分流傳面也比較廣，研究近代或民國歷史，很少存在所謂的孤本、善本、珍本問題，因為當時印刷術已逐漸普及，存世的文獻資料相對多一些。當然個人資料是有「孤善珍」的，比如說蔣介石日記，張學良、閻錫山、何應欽等等都有日記留存，這種「孤善珍」就比較豐富。

我可以講一點，就是民國時期的書雖然多，但是它的主要文獻對圖書館的要求並不嚴。但是明清就不一樣了。明清第一是書多，第二那個時候沒有現代印刷術，很多書都是以善本、孤本、珍本、稿本的方式存在的，研究明清史，不跑大圖書館就很難辦，因為很多史料都只有孤本、善本，僅在全國不多的幾個圖書館藏有。所以有人說研究明清史如果不在北京的話就很麻煩，因為其他地方都不可能看到這些史料，要跑到北京來查一趟資料也很難，「善本」的範圍越劃越大，我們當研究生時「泡」圖書館能看的資料，現在很多都收藏進入「善本室」看不到了，看微縮膠捲又容易導致眩暈，我在北圖（今中國國家圖書館）連續看微縮膠捲一久，就有嚴重的暈車感，只能歇歇看看。

有人說，研究宋元史蒐集閱讀史料，窮一個人一輩子之力，「竭澤而漁」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研究明清史是做不到的，當然針對某一個具體的小問題另當別論。由於史料太多，不僅閱讀不完，全面檢索你都做不到，因為沒法錄入那麼多東西，現代電子檢索手段也沒法對付。所以明清史研究任何人恐怕都可以找出新材料，只要你肯下功夫。

但研究秦漢史，文獻相對來講要少得太多太多。不要說比明清，比唐宋都要少得多。根本談不上浩如煙海，「竭澤而漁」很容易做到，因此提出新的見解就很重要。

秦漢史研究也不是說就沒有新材料，這些新材料主要是來源於考古，來源於地下出土材料。曾經有一度吵得沸沸揚揚，說某人家裏藏着一個

《孫子兵法》的珍本，說是世代相傳的。如果是埋在地裏，兩千多年人們都不知道，後來發掘出來了，那就另當別論，比如說開發秦始皇陵發現什麼文獻，是有可能的。但是這個人說，它不是埋在地底下的，而是他們家世代相傳的一個《孫子兵法》的珍本，或者說是傳本。老實說，這樣的東西基本上沒有多少人信，別說專家了，從常識判斷可信程度有多少呢？因為像秦漢時代的典籍，保存了兩千多年而且不是埋在地下後來被發現的，而是一直保存在民間但又不為人所知，以至到現在有人說我藏着一個什麼孤本，這幾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早十幾輩子，在唐宋時期都算是大事，何以能存到今世無人知曉。

因此，秦漢史研究的史料基本上不太依靠所謂的珍本、善本、孤本、稿本這一類的文獻，除非專門做版本校勘，而且版本目錄學和史學根本就是兩種學問。秦漢史的新材料主要在於地下的材料。應該說這些年來地下的考古挖掘屢次有很驚人的發現，而且往往是一次發現就相當於以前所有發現的總和。像走馬樓吳簡，出土了十萬多枚，一次就超過了此前出土所有簡牘的總和。前些年發現了里耶秦簡，這一次發現的秦簡三萬多枚，也超過了以前的睡虎地、青川這些地方出土所有秦簡的總和。[2]

這種大規模出土的簡牘最近相當多，當然還有最近成為清華驕傲的「清華簡」，一批楚簡入藏清華大學，不過這個和秦漢史扯不上什麼太大關係了。真正和秦漢史關係比較大的，有民國年間出土的河西漢簡，基本上就是甘肅西部地區的，包括疏勒河流域的、額濟納河流域的，後者以前叫作「居延漢簡」[3]，就是漢代河西軍屯地區的這些簡牘。其次就是 20 世紀 70 年代以後發現的睡虎地、鳳凰山、張家山、銀雀山這一批秦漢時期的簡牘，其中尤其是張家山漢簡，它基本上是法律文書，對於漢律研究的作用很大，有了張家山漢簡，我們就基本上能了解漢代的法律制度。[4] 從這個方面來講，大家對秦漢史有興趣還是一定要有跟蹤的精神，因為這些出土文物往往會帶來比較重大的發現，同時這也是考驗我們耐心的一件事。所以研究秦漢史和機遇也很有關係，近幾十年秦漢史每一次研究高潮幾乎都是圍繞這些考古發現興起的。

第四節　秦漢時代的重要性

我們之所以重視中華文明史中的秦漢時代，原因之一就是它在中國以及漢民族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方面佔重要地位。大家都知道現在西方把中國叫作「China」，「China」這個詞很多人都認為是「秦」諧音過來的，當然此說還是有爭議[5]，但是現在大部分人是這樣說的。因此，我們這個國家實際上是在秦以後被世界認識到的，當然這是指的英文，像俄語中稱呼中國完全就是另外一個說法，叫作「Китай」，很多人說這是和契丹有關。「Китай」是不是契丹也是一個問題，但是很多人認為它和「China」完全是兩回事，反映了很多中亞國家、斯拉夫國家對中國的了解。這個詞的來源其實也有一定問題，可能有的人知道，莫斯科克里姆林宮所在地，傳統上俄文就叫作「китайский город」——中國城。可是這個地方怎麼會叫「中國城」呢？那裏不僅現在沒有華人，古代也沒有華人聚居的記載。所以它的詞源說法也很多，都沒有定論，到底和中國有什麼關係也是說不太清楚的一個問題。

但至少在英語世界中、在世界上的絕大部分地方，中國被叫作「China」，「China」又被大部分人認為就是「秦」的轉音。而我們中國的主體民族到現在還被叫作漢族，這個漢族顯然也是從秦漢帝國時期的漢帝國形成的。

中國人經常以這些歷史上形成的王朝作為自己的族羣識別標誌。在國外，很多中國人被叫作唐人，中國人聚居的地方叫唐人街。但是在國內叫唐人的就比較少了，大部分還是自稱為漢族的。我們周邊的一些國家還有另外一些說法，比如越南按照他們的官方定義，共有五十四個民族，其中華人分為三類（社會主義國家都不太承認跨境民族，比如我們不把境內的越南人叫越族，而叫京族。越南也一樣，不把在越南的漢人叫漢族）：一類叫作華族，這是很晚才移民到他們那裏去的；一類叫作艾族，實際上指的是客家人；一類叫作山由族，是明朝末年開始從中國廣東逐漸遷入越南的人的後代（有人說他們與畲族有淵源關係）。越南歷史上還有一個

稱呼——「明鄉人」，指的是明代到越南去的一批中國移民及其後代（主要是漢人）。但是不管怎樣，至少我們自己，最常見的稱呼、自稱還是漢人。因此，秦漢時代在我們民族和國家認同形成的歷史中是佔有很重要地位的時代。

三千年來中國的歷史發生了很多變化，而其中最大的變化在哪裏呢？又是在什麼時候呢？

學術界有一個共同的觀點，就是認為近代以來中國面臨的變化是前所未有的，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語）。我們現在面臨的變化的確是前無古人，這一點是應該成立的，但是這個變化到現在也沒有結束，我們還不知道它最終會變成個什麼樣子。

在此之前，中華文明曾經有相當的穩定性，而在這之前的另外一個變化發生在什麼時候呢？曾經有過一個時期，尤其是晚清，河南殷墟的甲骨出土以後，很多人覺得看到了一個新天地，於是王國維先生有一句話，叫作「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6]。他非常強調殷周之間的這個變化，而且認為這個變化是最根本性的變化，殷周以後，所有的其他變化都比不過它。

以王國維先生為代表的一些研究殷商史的人，他們經常講殷、周有多大多大的區別，比如說周人主要是拜祖先的，但是殷人鬼神的觀念就很強烈。甚至曾經有人一度認為殷和周乾脆就是兩個文明，兩個民族，甚至有人說是兩個種族。[7] 有些人就把「小邦周克大邑商」這樣一個過程，類比為西方羅馬帝國末期的蠻族征服，認為西周是一個蠻族，它滅掉了類似於羅馬帝國一樣的殷商帝國，引起了一場非常大的變革。大家知道，蠻族入侵毀滅了羅馬帝國，這是西方歷史上非常重要的篇章，也是古代和中世紀的分界線。因此有些人就說，這個變化的意義非常大，甚至認為這就是「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分界。所謂的「西周封建論」就來源於此。以前經常有人說西周是封建制的，殷商是奴隸制的。[8]

這種說法隨着甲骨文的出現曾時興一時，在此之前人們並沒有這種概念，在這以後人們也逐漸不這樣認為了。以前人們經常講的是「三代（夏、商、周合稱）」如何如何，尤其是中國的儒家一直把三代看作是比較相近的一個時代，就是所謂的「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9] 直到春秋戰國，有些人認為社會不行了，於是禮壞樂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10]，出現了一個很大的變化，以至到了以後，這個觀念仍然根深蒂固，人們認為三代是一回事，三代之後又是一回事。而且很多人都懷念三代，說那才是中國的一個理想時代，以後就一代不如一代了，認為後世人心不古、世風日下。顯然這些人認為「周秦之變」是一個關鍵點。

所謂「殷周之變」十分重要，大概是王國維先生開創的一個觀念，雖然後來還有很多人附會，但是這個說法到了改革開放以後就逐漸淡化消散了。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20 世紀 70 年代出土了很多周原甲骨。以前我們只知道殷商有甲骨，西周好像我們只看到有金文，而且我們看到的金文往往時間比較晚，「后母戊」（以前誤寫為「司母戊」）那樣的殷金文沒見過。周原甲骨更不知道。一看殷甲骨，確實與周金文大不同，有點「劇變」的樣子。

但周原甲骨發現後大家的看法就改變了。周原甲骨大部分是先周的甲骨——所謂「先周」就是滅殷之前、與「商朝」並存作為諸侯的「周」。人們往往有這樣的分期，就是到了周滅掉殷以後，作為一個王朝的周，就分為早周、晚周；類似秦、漢被視為一個「朝代」。但是它們的王室在統一以前作為一個諸侯國就存在了，比如「先秦」就有秦國（其實「先漢」也有漢國，就是項羽把劉邦封在漢中當個諸侯，當然時間很短、地方又小，歷史上基本不提這個「先漢」）。而產生周原甲骨的這個國家，我們一般把它叫作先周，就是沒有滅掉商以前，作為一個諸侯國或「方國」的周。現在我們看到的周原甲骨就是那個時候的。

對於周原甲骨的認識，人們有一點是明確的，就是這些甲骨是周人刻寫，並非殷地移來。而與殷墟甲骨相比雖然片小字少，不夠「發達」，但文字相同，並非「外文」，所以殷周其實文化上是一體的，文字系統完全是一樣的，基本上不能視為兩個文明。這當然就不存在周克商是蠻族征服

的問題，和日耳曼人與羅馬人的關係完全不能等同。

簡單說，現在研究者們認為殷周之間的差異，比我們以前想像的要小，尤其是比王國維那個時候想像的要小。其實早在周原甲骨發現之前，甲骨學家、古史學家胡厚宣就撰文指出：「蓋今人每以中國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中國一切傳統的文化禮制，大半皆由於周公之制禮。據吾人觀之，周起西土，在早期幾無文化之可言，及入主中土，乃全襲殷商之文化，幾乎無所變革，故殷與西周實為一個文化單位，其劇變不在殷周之際，乃在東周以來。」[11] 後來郭沫若引入蘇聯「奴隸社會」之說並指殷墟人殉為奴隸社會之證後，有人又想起了王國維的「殷周劇變論」，便把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界線劃在殷周之間。但現在一邊是周原甲骨支持殷周文化一體，一邊是「五種社會形態」論式微，所以現在古史分期討論中，強調商代是奴隸社會、西周是封建社會的觀點的人也比較少了。

而強調周與秦的區別，強調春秋戰國之交中國發生了非常深刻的變化，這個說法古已有之，現在影響還是相當大。儘管變化的內容有不同的理解。在以郭沫若為代表的那個史學年代，人們把這個變化套入了「五種社會形態依次演進」的意識形態框架中，說春秋戰國之際中國出現了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的演變，這個說法的意識形態背景現在很少有人提了。但是憑直觀的感覺，學術界多數人仍然相信，春秋戰國之交中國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把它叫作什麼社會變成什麼社會、給一個形態學的稱謂，可以見仁見智。但有一點應該還是靠得住的，那就是三千年內，中國發生的最深刻的變化大概也就是周秦之變。經此一變後，接下來再一場可以與之相比擬的劇變，可能就是從晚清到我們現在面臨的這個時代，除此以外沒有哪個時代能有這樣巨大而深刻的變化。當然，漢—魏之變、（北）魏—隋之變、唐—宋之變也是有的，但都沒有周秦之變那麼厲害。

很多人都說，世界歷史上有三大軸心文明，經過百家爭鳴逐漸形成文明的主流價值觀，大致上一個是古希臘時代，一個是所謂印度的列國時代，還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經過一段各種學派的交流和爭鳴，最終進入到一個比較穩定的時期，就是獨尊某某的時期，於是便構成了以後文明的基本框架。秦漢顯然就是由軸心文明過渡到一個比較穩定的文明的這樣一個時期。因此在中國的縱向歷史發展中，秦漢帝國具有一個特殊地位，它的一些標誌性的實質內容在今天仍能看到。

在世界文明中，現在人們也往往公認，在公元前後的這幾百年中，世界各地存在着各種各樣的文明，但是其中對後世影響最大、輻射力也最強的就是歐亞大陸兩端的，以秦漢帝國和同時期的羅馬帝國為代表的這兩大帝國。因此在世界史的範圍內，做秦漢史和羅馬史的比較研究一直是一個很熱門的領域，尤其是所謂的「魏晉封建論」[12] 這一支，更是把秦漢和羅馬當作「等值」的兩個對象。在社會經濟層面，人們發現的共同點就更多了，比如說城市的興起，貨幣制度的演變，甚至還有人得出了這麼一個研究結果：有人曾經統計過羅馬帝國的黃金擁有量和漢帝國的黃金擁有量，據說兩者幾乎一模一樣，大概都是一百七十多噸。[13] 而且這兩個國家在經濟發展中也的確出現了一些可以類比、十分相似的問題，比如羅馬帝國一度使用黃金作為貨幣，成為一個很突出的現象，但是到了中世紀早期，出現了一個懸而未解之謎——「黃金消失之謎」，或者說「金幣消失之謎」，中世紀初期這些黃金好像一下子都不見了。漢代其實也有這樣的現象，也有所謂的「漢金消失之謎」，漢代大量使用黃金，但是漢以後黃金好像不見了。尤其從稱呼上，漢代提到黃金一般都是說多少斤，漢以後就變成多少兩了，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個對比。[14]

但值得注意的是，現在羅馬文明在地面上的遺跡到處都有，不要說羅馬都城那規模宏大、至今林立的競技場、凱旋門、萬神殿、輸水道，就是在羅馬帝國疆域所及的中東、北非，甚至萊茵河、達西亞、兩河流域北部乃至不列顛那樣當時在羅馬帝國算是非常邊遠的地方，凡是歷史比較悠久的城市裏都可以看到古羅馬時期神廟的遺跡、大劇場的遺跡、各種各樣公共建築的遺跡。[15]

但是漢代的公共建築，現在我們基本上都見不到了，大概只有四川、河南、山東還保留下幾個所謂的漢代石闕，這是我們現在唯一能夠看到的在地面上留下來的漢代建築。而且似乎不僅現在如此，從著名唐詞《憶秦

娥》所謂「西風殘照，漢家陵闕」等語看，唐宋時漢代地面遺存就已經不過如此。應該承認在建築技術上恐怕秦漢帝國和羅馬帝國差距是非常大的。我們雖然是文明古國，但是明清之前地面上的建築保留下來的非常少，或許也與建材的石質和磚木之別有些關係吧。至於其他原因我們在這裏就不展開了。我們的文明遺存主要表現在墳墓等地下發掘出來的東西。

但如果單純就農業文明本身而言，我覺得中國秦漢時代應該遠遠超過當時的希臘—羅馬，如果我們以土地利用率，或者是複種指數來衡量的話。羅馬時代的農業文明應該說也相當發達了，但如果跟同時期的中同相比的話，至少土地生產率就不會比中國高。當然，勞動生產率就不一定。中國農業一直有精耕細作的傳統，這一點就是從秦漢時期開始的，後來也一直延續。即使在中國被認為是「東亞病夫」所謂落後了的近代，我們的土地畝產量也還在世界上數一數二，只不過人均佔有量很少，勞動生產率那時已經遠遠落後了。

有人曾經做過這樣的對比，說漢朝最盛時，也就是西漢末，有近六千萬人口，當然這是戶籍統計數字了，加上「浮遊無籍」「不書名數」的黑人黑戶，實際人口應該超過這個數字。而羅馬帝國興盛的時候，就是在圖拉真、哈德良的時代，現在比較流行的說法是，羅馬帝國的人口達到峰值，有一億左右。[16] 考慮到兩邊統計都有模糊，應該說大體相當。到了中世紀，兩邊人口當然就都掉下來了。中世紀在前羅馬帝國盛世疆域內的人口，早期大概在六千萬左右。東漢以後中國人口（漢朝疆界內）也明顯下降，此後一直到宋朝很長一段時間，至少在戶籍統計上中國人口都沒有恢復到西漢末的水平。

漢代與古羅馬的城市都有過很大的發展。漢長安城的人口，據有些研究者說，大概有三十多萬。在西方，對羅馬城的一個通常的估計是，羅馬帝國和平時期的人口一度達到過一百萬。與許多估算出來的古代數據一樣，這些都有爭議。沒有爭議的是城牆內面積，由於遺址清楚，一量便知：漢長安城內有 34.39 平方公里，羅馬（奧勒留城牆）內面積為 13.86 平方公里，只有漢長安的 40%。

但是作為典型的「秦制」城市，考古和文獻都證明漢長安城內 70% 以上的地面都是大型宮殿和官署，居住密度很低，民居與市場多在外郭。而羅馬城內大都是民居、商業設施和公共建築，人口密度要大得多。西漢末年人口最盛時戶籍統計，長安人口有 24.62 萬，[17] 有人認為這只是城內納稅民戶，加上不納稅也不計入戶籍的宮廷及其服務人員和軍人等，應當有四五十萬。這是有道理的。不過長安城內既然絕大部分面積都是宮殿，其餘最多不過 10 平方公里的空間不可能容納 24 萬平民，所以這個數字應該是包括了郭外郊區（但不含陵邑、屬縣）的總人口。古羅馬的數字則是根據當時嚴格的貧民糧食配給制度（Cura Annonae）按比例推算，也有相當可信度。但同樣，不到 14 平方公里的奧勒留城牆內即便沒有大型宮殿，也容不下百萬居民，所以應當也是包括了郭外郊區。

換句話說，不同的統計方式換算成可比口徑，羅馬的城市規模還是明顯大於漢長安。當然，重要的區別還不在於規模，長安的森嚴空闊與羅馬的熱鬧繁華，完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城市類型和人文景觀。

秦漢和羅馬帝國之後，這兩個地方都出現了城市衰落的現象。一直到了隋唐以後，中國才出現了二度的大城市崛起。而在歐洲，羅馬帝國之後，就大城市而言，顯然西方是遠遠不能望中國之項背的，像唐長安、宋開封那樣的超級城市在西歐中世紀是沒有的，即便中國之外，像薩珊波斯的泰西封、阿拉伯帝國的巴格達這些東方帝國的大城市規模也遠超中世紀西方。但是關鍵在於，這種東方帝國城市與西方城市的類型差異，早在秦漢—羅馬時代就存在了。

還有人做過秦漢和羅馬的農書的比較，秦漢時代出現了幾本農書，比如《氾勝之書》《四民月令》等，羅馬也出現了所謂三大農書，就是加圖、瓦羅和科路美拉寫的，翻譯過來都叫《論農業》，英文都叫「On Agriculture」。這三本書有人曾經分析過，說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都談到農業經營方式的盈利性，尤其是科路美拉，關於不同作物的最佳經營規模、地租利息和利潤的比較都有涉及。而秦漢農書趨向於精耕細作的

技術方面，卻不太談盈利。

當然，第一帝國的歷史地位，不僅可以從橫向比較，也可以從縱向比較來看。「上古」世界的秦漢與羅馬帝國，似乎很難比誰更「發達」。但是「中古」的世界上，歐洲中世紀在大部分時間內明顯不如中國的唐宋帝國，無論就農業和城市規模，還是就當時旅行家的觀感，這都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唐宋與秦漢相比如何？這就有點微妙。國外（包括西方和日本）有所謂「唐宋變革論」，認為宋較之於唐是個大進步。就直觀來看，宋代城市不僅人口多，而且性質進化。熙熙攘攘的「街市」與唐代森嚴的「坊市」相比，確實有點「近世」和「中世」之差的感覺。但是漢唐之比就不那麼好說。至少就商品貨幣關係的發達而言，漢代的「古典商品經濟」高峰，「盛唐」似乎並未超越。本書最後一章要討論這一點。

秦漢與羅馬帝國如果各有高下，隋唐帝國又明顯比同時期的歐洲發達，但與漢相比卻很難說有什麼超越。這在邏輯上就意味着：同一時期的歐洲，尤其是西羅馬帝國故地發生了大倒退，以至於並不明顯超過漢帝國的隋唐，卻明顯地超過了中古早期的歐洲。這本來是傳統的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說也認可的。

但是近幾十年來西方的中世紀史發生了「革命性變化」，主張與羅馬帝國連續性的「羅馬派」取代認為「蠻族征服」帶來「黑暗時代」的「日耳曼派」成為主流，晚期中世紀領域的「早期近代化」和「早期工業化」之說也方興未艾，這麼一來，中世紀「黑暗時代」之說似乎已經過時。但是，這與我前面說的邏輯推論又是相矛盾的。所以我覺得，無論中國、西方還是其他地方，發展進程都需要有個全球視角。西方的「中世紀史革命」能不能站得住腳，恐怕還得進一步在全球視野中驗證。研究中國「第一帝國」歷史的意義，也就不限於中國史，更不限於所謂「斷代史」領域了。

因此，不管是相同還是相異，我們文明的框架實際上在秦漢時代就已經基本奠定了，所以認識中國，認識我們這個文明，秦漢是一個繞不過去的重要時代。

註釋：

1 也有別的劃分法和階段，如第三中間期、晚期王國等。

2 從書寫材質面言，寫在竹片上的為「簡」，寫在木片上的為「牘」，連稱「簡牘」，還有寫在帛上的，主要是典籍，故稱「帛書」，又有「簡帛」之連稱。四川省青川縣出土的是木牘，一般稱為「青川木牘」。

3 額濟納河流域（包括今甘肅金塔縣和內蒙古額濟納旗地區），為古居延地區（漢代設張掖郡居延縣），故此處發現的漢簡稱為「居延漢簡」。1972—1986 年此地又出土近 2 萬枚漢代簡牘，稱為「居延新簡」。

4 2018 年荊州胡家草場墓地出土了一批西漢簡牘，共 4642 枚，是迄今單座墓葬出土簡牘數批最多的一次，也是出土漢律種類和數量最多的一次，約 3000 枚，並首次發現漢令典。這批漢簡將繼張家山漢簡後進一步推動對漢律的研究。

5 例如，著名語言學家鄭張尚芳先生就認為梵文 Cina（支那）、英語 China 等，源自北方草原民族對春秋時期北方晉國之「晉」音譯，類似下文提到的俄羅斯將中國稱為「契丹」。鄭張尚芳：《「支那」真正的來源》，載《胭脂與焉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 年，第 1-5 頁。

6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第 10 卷，見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 8 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 302 頁。

7 傅斯年在《夷夏東西說》這一名文中就提出，夷與殷商屬於東系，夏與周屬於西系，見傅斯年：《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7 年，第 67 頁。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對商人人種與起源的探討，見張光直著，張良仁、岳紅彬、丁曉雷譯，陳星燦校：《商文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 年，第 367-388 頁。關於商周的族羣起源，歷來眾說紛紜，參見張國碩：《夏商周三族起源研究述評》，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96 年第 10 期。通過考古發掘，人骨體質類型、古 DNA 的研究對於商周人的族屬、人種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釋，例如：朱藍《關於殷人與周人的體質類型比較》，載《華夏考古》1989 年第 1 期；賀樂天、劉武：《殷墟青銅時代人羣顱骨表型的數量遺傳學分析》，載《科學通報》2018 年第 1 期。

8 「西周封建說」的首倡學者為呂振羽，參見呂振羽：《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其他贊同並主張此說的學者有：吳玉章、范文瀾、翦伯贊、楊向奎、徐中舒、王玉哲等。